



38年前,我听杨益言讲故事

他讲述了在歌乐山渣滓洞的亲身经历
以及畅销小说《红岩》的创作过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显涪



渣滓洞监狱



杨益言(右)与作者



1987年,我调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《红岩春秋》杂志社当记者。进入杂志社的第二个月,领导就安排我采访《红岩》作者之一杨益言。那是一次我终身难忘的特殊采访。

1

歌乐山恐怖的竹梆声

没有开场白,也没有任何寒暄。杨益言开门见山,以第一人称讲起了他的故事。

1948年8月的某一天,我在朝天门附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。那天,我正走在路上,头上突然被蒙上一块黑布,然后被推上一辆汽车,还没等我坐稳,车子就仓促启动,朝着远方驶去……

我在车上不知被颠簸了多久,突然四周传来恐怖的竹梆声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呀,充满着阴森、可怕,令人恐怖。这声音在歌乐山的野林丛里四散飘开。汽车猛然停下,我被粗鲁地推下车,蒙住我双眼的黑布随即被扯开。出现在眼前的,是一片黑色的岩石和山谷,山谷间耸立着一个个阴森森的岗亭。那些令人心悸的竹梆声,正是从岗亭中传出来的。

黑沉沉的天空下,我看见手铐上的英文字符:MADE IN U.S.A.我被押进了竹梆声下的黑牢。

2

我的名字变成了258号

我看见,站在我面前的特务全部身着美式制服,手拿美式枪械,旁边的桌椅上,用白色油漆写着“中美所”或“中美合作所”的字样。凶神恶煞的特务涌上来,对我全身进行搜查,然后宣布:“现在你已经没有名字了,记住你的号码,258号。”随即,特务厉声说:“这就是你的名字,这里绝对禁止用原来的名和姓,更禁止与任何人交谈,违者严厉惩处。”

我被押着穿过了响着竹梆的高墙岗哨,来到一处院坝。迎面是16间男牢房,对面不远处是两间女牢房。我被关进楼上的第二间牢房,牢房里有27张倔强、陌生的面孔,他们直盯着地望着我,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。我想:这是什么地方?那些不屈的面孔是些什么人?我心中突然感到很模糊,但又很熟悉。是的,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,我和他们并不陌生。

1925年,我出生在重庆朝天门。中学时代在北碚兼善中学度过,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。我在同济大学上的电机系,一心想毕业后实业报国。一开始,美国人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,可后来他们却帮国民党打内战,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。我们不能在平静的课堂里坐下去了,全国青年掀起反内战、反迫害的高潮。1948年初,同济大

学的热血青年聚集到上海外滩英国领事馆门前,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炮口对准青年学生,飞机呼啸着从学生头上飞过……1948年1月28日,同济大学工学院被国民党军警包围,当时我正在负责学联的汕印报编辑工作,我上了特务的黑名单,但侥幸逃脱。可回到重庆后,我还是被特务逮捕了。

3

我受过酷刑,但什么也没说

一天,特务把我从狱友中强行拉走,对我进行了审讯。那是我受过的最痛苦过程,一是肉体上的痛苦,二是精神上的痛苦。我要坚持住,什么也不能说。我知道,狱中随时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,我也有可能。即使这样,我也决不能屈服。我知道,敌人只掌握了我在大学办报的情况,其他情况他们并不知道。于是,无论他们怎么折磨,我就是咬紧牙关,只承认办过报,而且只是搞油印,别的什么也不知道。

牢房的酷刑被竹梆声笼罩着,许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,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就是在特务的酷刑下牺牲的。那时的重庆酷热难当,我们只能在牢房里侧着身体睡觉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,龙光章等9名战士在川鄂边被俘后,一路受尽折磨,关进渣滓洞时只剩他和指导员李泽两人。然而,这里的霉米饭、酷暑、疾病和蚊虫等非人的折磨终于把他们摧残垮了。龙光章被折磨至死的噩耗通过牢房的秘密孔道,传遍了监狱,人们愤怒了。我也参加到这场斗争中,并学会了使用秘密孔道。在斗争中我们认识到,只有大家不怕牺牲、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胜利。我也参加了绝食斗争,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。

无奈之下,敌人答应给难友开追悼会。牢门全部打开,18间牢房的狱友迈着沉重的步子,走向追悼会场。黑布袜子撕成黑布条,做成了黑纱,胸前的黑色花朵也是用它做成的。女同志头上的白花,是白衬衫撕烂后做的。狱友们走到院坝中央,没有人说话,只有沉重的脚步声。我们压抑着满腔怒火,站在放风场。刚满46天的“监狱之花”,也在妈妈的怀抱里,加入了追悼会的行列,她那大大的晶亮眼睛,头一次见到了牢房外的天空。

同志们的挽联是用一方方小草纸做成的,挂满了四丈多宽的高墙,风一吹过,发出“哗哗”的响声,那是哀悼难友的哀乐。挽联旁边,放着大家采集野花做成的花圈,中间有一个大大的“奠”字。此时,高墙上又增加了一排机枪,黑黑的枪口凶神恶煞地对着我们,但我们没有一丝害怕,依然把追悼会进行了下去。谁能相信,在这与世隔绝的集中营,竟然开了一个为革命者举行祭奠的追悼会。

我们悼念着为人民事业献出了生命的龙光章烈士,风儿伴随着龙光章的灵魂,在歌乐山的竹梆声中冉冉上升……

4

写作《红岩》的过程

我在渣滓洞被关押了几个月。1949年11月27日,我得到罗广斌的帮助,加上党组织的营救,最终得以脱险。

当时,我在放风的时候假装体能训练,罗广斌他们成功说服了一名叫杨钦典的看守,他也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,同意帮助我们,我们终于大难不死。脱险后的第一件事,我们想方设法联系解放军,让他们赶快去渣滓洞解救战友。

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,我把署名杨祖之的文稿《我从集中营出来》送到重庆《国民公报》,四天后文章发表。这是我第一次系统讲述渣滓洞监狱发生的革命斗争,引起了轰动。1950年4月,我被分配到重庆团市委工作。1955年,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少年向英雄人物学习,重庆市委组织部报告团,我和罗广斌、刘德彬等人参加了报告团。我们到自贡、成都、江津等地,巡回报告渣滓洞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,讲得我热血沸腾。1956年,在哥哥杨本泉的建议下,我们向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请假两个月,在南温泉开始了文学创作。我们各自写出了自己熟悉的革命故事,然后汇集在一起,取名为《禁锢的世界》。当时,除少数稿件在《重庆日报》发表,其余的稿件没有发表。

1957年,团中央在讨论干部写作时,有人提出了这个题材,于是四川和重庆两级团组织提出,希望组织人员创作这方面题材的作品。经过讨论,重庆两级文联决定将此题材的创作,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。

1958年,中国青年出版社的《红旗飘飘》向我约稿,而此时我正患严重肺炎。团市委为照顾我,安排我值守办公室,我

5

采访杨益言的后话

对杨益言个人的采访告一段落后,在接下来的采访中,我又有幸采访了杨益言的夫人何明杨。

何明杨回忆说:“接到写作任务后,杨益言压力很大。创作愿望和实践矛盾经常困扰着他,他睡不着觉,就半夜起来翻找写小说的资料。”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也说:“杨益言他们写得很苦,初稿写出来后,很不满意。”

后来,我又采访了当时的编辑王维玲。据他回忆,初稿写成后,杨益言和罗广斌对书中的人物塑造很不满意,《红岩》几乎就要半途而废,但大家都对这部小说抱有很大期望。各方通过不同方式,给两位作者打气,鼓励他们走出困境。

1960年夏,重庆市委组织部安排杨益言和罗广斌到北京,参观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时期的电报手稿,这给了他们极大启发。杨益言说:“我们看后觉得,需要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考虑小说的谋篇布局,以及人物塑造。”

1960年冬,新的创作开始了。他们写作的地方没有暖气,脚冻僵了、手写僵了,没有加强营养的食物,可想起狱中革命斗争的战友,他们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创作热情。那年冬天,他们还专门到华蓥山武装起义的革命遗址,重踏先烈足迹,收集人物故事、探访英雄事迹,丰富小说情节,当时正在武胜采风的著名作家沙汀和艾芜与他们见面,共同研究,修改稿件。

1961年12月,这部历经坎坷的长篇小说《红岩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,社会反响强烈,后又多次印刷,总销量远超1000万册。

《红岩》作为一部革命题材小说,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,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,成为一代中国人不能忘却的记忆。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《红岩》封面



杨益言讲述当年的故事